

有限机会的公平分配

中国农民子女市民化的水平与模式

社会
2014·4
CJS
第34卷

李 丁

摘 要: 本文将农民、农民工以及已经获得非农户籍的“新市民”的“农民子女”作为分析对象,以农民子女跨越城乡二元系统的市民化进程来透视中国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与社会分层流动机制。基于 CGSS 调查数据等资料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职业非农化水平快速提高,但身份市民化机会长期保持不变,两者之间的断裂日益扩大。这种断裂不仅表现在水平上,也表现在分配机制上。职业非农化的途径日益多元化,教育的作用相对弱化,家庭背景有着相对重要的作用。而户籍非农化(身份市民化)因升学之外的传统途径不断收缩,教育成为影响户籍非农化的主要因素,从而保持了有限的户籍非农化机会在农民子女间分配的公平性。

关键词: 农民子女 市民化 职业非农化 身份市民化

Equal Distribution of Limited Chances: A Study of the Citizenship Shifts of Chinese Peasants' Children

LI Ding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ocial mobility and stratification of peasants' children can be a good indicator measuring social openness of China under a rapid

* 作者:李 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Author:LI Ding,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National Survey Research Cente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National Academy of Development and Strate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liding@ruc.edu.cn

**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成果(12XNF035)。[This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and the Research Fund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12XNF035).]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主持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2011年全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的协助,也感谢《社会》两位匿名评审专家的建议。文责自负。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ircumstance. In an urbanization framework, their social mobility can be operationalized as transition to non-agricultural occupations and change to urba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ukou*) holders. Peasants' children here include farmers, rural migrants and those who have changed their *hukou* type from rural to urban. They have similar original social backgrounds but are differentiated by occupations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ypes. Based on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amples of this population, the paper tries to provide a more complete picture about the openness of Chinese society than conventional studies of occupational mobility based on city samples and labor studies on migrant workers did.

CGSS data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probability of occupational transition and citizenship transition of peasants' children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ages. It finds that the occupational transition pace is quite faster than the transition of citizenship. The probability for peasants' children to earn urban citizenship is stably low. The gap between occupational transition and citizenship transition is becoming larger and larger. It also finds that the traditional channels through which peasants' children can become registered urban citizens are becoming narrower. The rapid expansion of urbanization brings in new chances and channels. Based on these, several hypotheses about the changing of mobility mechanism are developed. The main one i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citizenship transition chances is relatively fair and equal.

These hypotheses then are tested by comparing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se transitions in different job-cohorts with CGSS data. It shows that the occupational transition is highly influenced by the family background.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is becoming smaller and smaller. Meanwhile, the distribution of limited citizenship transition chances is relatively fair. Education is always the main factor that differentiates the probability of citizenship transition.

It concludes that the openness of Chinese society is a complex issue. It is quite open in terms of the Chinese peasants' children's opportunities to find a non-agricultural job. But the process is highly influenced by the family background and parents' social economic status, which is especially the case for getting good jobs. Meanwhile there are limited chances for peasants' children to change their citizenship type, bu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chance is relatively stable and fair. The speeding up of "citizenization of people" (changing thei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ype, giving them equal urban citizenship and public welfare) driven b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will lead to expansion of citizenship transition chance, but the core of openness, fairness, is still a problem.

Keywords: peasants' children, urbanization, non-agricultural transition of occupation, transition to registered urban citizen

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其中以工资方程、社会地位获得模型和流动表分析技术为基础对中国的不平等及社会流动展开的深入分析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Bian and Logan, 1996; Bourdieu, 1990; Cao, 2001; Featherman and Hauser, 1978; Grusky, 1983; Hauser, 1981; Li and Walder, 2001; Nee, 1989; Nee and Matthews, 1996; Walder, 2002; 边燕杰等, 2002, 2008; 郝大海, 2010; 李春玲, 2006, 2007; 李路路, 2003a; 梁玉成, 2006; 刘精明, 2001; 刘精明、李路路, 2005; 吴晓刚, 2006, 2007; 吴愈晓, 2010, 2011; 周怡, 2009)。其中, 以职业流动与关联度来测量社会开放度的研究大多发现中国社会职业代际关联度相对较低, 社会的开放程度较大, 以至于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社会 (Blau, 1990; Wu and Treiman, 2004; 李路路, 2006; 吴晓刚, 2007)。但对生活在其中的国人而言, 当前社会系统的封闭性及其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是鲜明的, 以至于可被称为一个“断裂”或“总体性”社会 (孙立平, 2003)。因此, 分层研究不得不更多地强调社会地位的代际关联性和阶层不平等再生产的间接性与隐蔽性以保持与社会舆论的一致 (方长春, 2009; 李路路, 2003a, 2003b, 2003c, 2006; 郑辉、李路路, 2009), 或者建构更为有效的阶层测量指标以涵盖中国社会因单位区隔、城乡分割、权力权威等级差异所带来的更为实质的不平等 (李路路等, 2012; 林宗弘、吴晓刚, 2010)。

样本选择性是上述研究得出社会系统开放性大的重要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能够代表中国城乡的全国整体性样本屈指可数。上述研究多数是分城乡进行的, 且以城市样本为主。而城市样本, 不管是户籍居民样本还是常住人口样本, 都受到人口迁移和人口政策的巨大影响。人口流动和计划生育的共同影响使外来人口在中国城市居民中的比例非常高。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 在中国城市常住居民中, 户籍在外乡镇街道的人口占 42.2%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表 1-2a)。如果考虑到那些户籍已经迁到现居地的人口, 迁入人口的比例会更大。这些迁入人口多数来自农村, 并且很可能具有潜在的选择性: 一方面, 他们的出身和先赋特征, 如父母的职业地位和教育水平等分层与流动

研究特别关心的变量的取值都处于最低的一端；另一方面，由于流动和迁移的筛选作用，这些人很多都具有某些后天能力或优势，是农村人中的“佼佼者”，他们会大大降低城市样本的收入、社会地位等因变量与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相关度，夸大整个中国社会系统的开放度（李骏、顾燕峰，2011；吴晓刚，2007）。

样本选择性同样出现在以农民工为关注核心的劳工研究中。与职业分层和流动研究形成鲜明对比，劳工研究得出了相对悲观的结论。研究发现，中国社会正处在快速的阶级化风险中，社会冲突日益加剧（黄宗智，2009；李强，2004；潘毅，1999，2005，2007；潘毅、陈敬慈，2008；潘毅等，2009，2010；潘毅、任焰，2008；任焰、潘毅，2006a，2006b，2006c，2008；沈原，2006；王春光，2000，2001，2002）。有研究甚至试图将农民工研究纳入阶级形成的分析框架，重返阶级分析（仇立平，2006；冯仕政，2008；李路路，2003a；沈原，2006）。他们通过展现农民工在资本的“压迫”及政府保护的“缺位”下的生存、认同和行动状况（包括自戕和反抗）来揭露现实制度的运作逻辑与不合理性，并探讨阶级作为一种社会行动者的可能（潘毅，1999，2005；潘毅、许怡，2012；任焰、潘毅，2006c，2008）。与此同时，这样的研究多少都“抱怨”农民工群体的沉默、温顺和不行动（陈映芳，2005a；潘毅，2005；潘毅、陈敬慈，2008）。这些结论之所以偏于悲观或激进，与其对弱势劳工群体的选择性关注紧密相关。进入这类研究视野的正是那些在社会流动中处于不利位置的个体——留守农村的人和彷徨于城乡之间的人。那些已经定居城市，实现了身份转变和社会流动的个体被排除在外，更不用说那些城市中的新中产群体和社会精英。

本文试图将农民、农民工和由农民转变而来的新市民等具有相同出身的“农民子女”放在一起进行研究，透过农民子女的城市化问题来度量中国社会系统的开放程度，探讨中国社会流动的机制及其变化。由此，不仅可以看到大量实现了职业非农化但仍彷徨在城乡之间的农民工，也可以看到部分已经获得了市民身份并融入城市社会的农民子女，从而更为全面地反映至今仍在中国占据绝大多数的农民及其子女的社会分化与流动进程，避免因观察对象的选择性而带来的片面结论和偏激观点。¹

1. 因此，在本文的概念中，“农民”更多地指一种身份而非职业。

一、以市民化统合农民社会流动研究

当我们集中关注农民子女的社会分化与流动时很容易发现,对中国农民而言,职业流动虽然重要,但并非关键,更为重要的流动是由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变(陈映芳,2012)。在中国人看来,长久但没有身份转换的职业非农化仍不足以将一个乡下人变为城里人,或把农民变为市民。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各职业内因身份差异而被区别对待的现象的持续存在,使初级的职业非农化的社会意义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往套用职业代际关联度来测量社会开放度和以职业地位来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的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选择了多少有些宽松的指标。不同阶层间的相对流动机会当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测量社会的开放度,但在城乡差异巨大的中国,最能测量社会开放度并影响社会结构转型的,莫过于农民及其子女跨越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化与流动。中国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将来是转变为相对稳定和谐的“橄榄形”结构,还是继续维持一个不稳定的结构,并保有一个庞大的底层贫困群体甚至一个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工人阶级(李春玲,2005;李强,2010;沈原,2006;孙立平,2003),关键之一取决于“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中最底层的农民及其子女的出路。只有出身农民阶层的社会成员能够顺利地分化并成长为与现代社会相匹配的相关社会阶层的成员,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型才是顺利的,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也才是鲜明的。以往社会分层研究套用西方的研究范式,集中关注职业地位的获得和职业的代际流动,将户籍差异与城乡结构作为既定社会结构来解释上述因变量(李骏、顾燕峰,2011;吴晓刚,2007),对跨域二元系统的流动(如城市户籍的获得)本身却研究很少,忽视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转型中这一更为关键的不平等和社会流动。而且,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非常不同于社会分层流动研究兴起于其间的成熟后工业社会。在那样的社会,社会职业结构是相对稳定的。农民群体只出不进的特征使基于相对流动率的代际地位关联测量失准(Xie and Killewald,2010)。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非市民(noncitizen)规模的扩大以及市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在新型城镇化政策的推动下,将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子女获得市民身份并认同自身的市民权利,对此过程的研究也将越来越多。

本文试图以农民的市民化进程衡量中国社会系统的开放性,探讨中国的社会流动规律,以市民化进程统合农民这一群体的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等社会分化和流动问题,在这方面,国内已经有大量研究(蔡昉,2010a,2010b;陈丰,2007;陈映芳,2003;2005b;管明,2010;刘传江、程建林,2008;莫艳清,2009,2012;文军,2004,2006,2012;徐建玲,2008;余京津,2012;张达,2012;张裴,2011;郑杭生,2005)。从这些研究可知,农民的市民化至少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生产方式的非农化与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和权利与身份认同的市民化(陈映芳,2005a)。前者对应职业的非农化与居住生活的城市化,后者对应市民权的获得与市民身份认同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市民化进程的第一个层次(职业非农化)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在第二个层次上收效甚微,其中“市民权”(urban-citizenship)得不到落实是市民认同与观念得不到发展的根本原因(陈映芳,2012)。本文用职业非农化测量生产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以是否获得城市户籍来标识市民化过程中“市民权”及市民身份的实现程度。这一测量指标之所以仍然可用,是因为与没有获得当地城市户籍的外来人口相比,获得当地城市户籍意味着个体得到了更多与市民平等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权利以及参与政治选举的机会(王美艳、蔡昉,2008),在制度上更多地被承认是当地市民。随着市民化的推进和各种从表面上消除户籍差别的行政努力的影响,建构更为精细的市民化进度测量指标未来将成为必要。

以市民化进程统合农民的社会分化与流动研究,不仅有利于弥补以往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研究的不足,还可以更好地吸纳以往有关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研究的成果。相对于将劳工研究纳入阶级形成框架和重返阶级分析(沈原,2006),市民化进程框架具有更强的包容性。阶级形成框架对研究劳工的认同、集体行动与组织化有一定优势,但很难解决“阶级形成”后不同社会阶层和阶级在城市社会中多元共存的问题,也难以解释现实中的“阶级不行动”问题。而市民化进程框架可以在宏观上预设多种阶级结构,在微观上为农民子女预设多种阶层出路,更为客观地确定劳工阶级及社会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相对位置,为个体的认同和行动提供更贴切的解释。相对于中产阶级形成研究而言,市民化进程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中产阶级从何而来、面临什么挑战等关键性问题。受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理想社会结构模型

的引导(米尔斯,1987),中产阶层研究将注意力集中于中产阶级的出现与形成,对其地位和作用、阶层认同、消费模式、政治参与和阶层再生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陈柏峰,2012;邓玮,2004;方金友,2007;李春玲,2008,2011;李强,1999,2005;吕大乐、刘硕,2010;齐卫平、肖照青,2003;沈晖,2008;温静,2003;杨华,2012;张建明等,1998;张金荣,2004;张宛丽,2002;张宛丽等,2004),希望这一阶层的形成能缓解中国社会的结构紧张,并使中国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升格到一个新的档次(李路路,2008;李路路、王宇,2008;周晓虹,2002,2005,2008,2011)。但是,中产阶层从何而来?忽视中国社会的“倒丁字型”社会结构与庞大的城乡迁移人口——潜在的新市民——对于城市社会阶层结构与阶级认同的影响,相关的研究多少显得有些不足。

当然,市民化进程框架会在一定程度上将那些无需市民化的群体排除在外,有忽视农民及市民各自内部的差异,并有过分拥护城市化和忽视其他现代化路径和出路的嫌疑,但这一框架在“城市中国”日渐浮现的现阶段,能抓住中国城市化问题的核心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郑杭生,2005;陈映芳,2012)。随着城市化内涵的扩展和市民化测量指标的精细化,相关不足还可以在市民化过程的相关研究中得到改善。

在市民化进程框架下,本文主要关注中国农民及其子女市民化的机会如何?这些机会主要依据什么进行分配,以及是否发生了变化?

二、有限的市民化机会: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的断裂

当前中国农民子女的市民化现状如何?一个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存在表明,中国农民的分化流动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也遇到了巨大的障碍(段成荣等,2008)。农民工群体规模越大,表明实现了职业非农化但未实现身份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的规模越大。农民的城市化进程日益分裂为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两个相互脱节的过程。这种断裂还直接表现为中国非农户籍人口规模与城镇常住人口规模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见图1)。长期居住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子女越来越多,但获得非农业户口且享受市民待遇的人数却增长缓慢。2010年,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额达2.1亿。这种断裂造成了农民工群体半城市化半无产化的状态和当事群体痛苦的城市化体验与阶级化冲动(潘毅等,2009)。其中,又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随迁农民工子女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有

更为强烈的城市化愿望,适应城市生产和生活的速度更快(段成荣、马学阳,2011;王春光,2001),但市民化机会却不一定有所增长。

如果将所有14岁仍未获得非农户口且18岁时父母户口均为农业户口的人界定为“农民子女”,²且每个农民子女自14岁开始就有着职业非农化与户籍非农化的可能,只要获得非农职业即跳出职业非农化风险集,³一旦获得了非农户口也就跳出了户籍非农化的风险集,那么,根据每年年初处于上述风险集的人数以及当年首次参加非农工作和获得非农户口的人数就可计算出各年份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和户籍市民化的相对概率。CGSS2006数据⁴中的农民子女样本的计算结果如图2中带标记的曲线所示。⁵可以看到,1985年以前,职业非农化与户籍非农化的水平大体相当,相差不大,整体水平较低。1985年以后,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的速度迅速提高,户籍非农化水平虽然有提升,但变化相对实在太小,年均非农化几率很多时候都不到1%。两条曲线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进程之间的断裂趋势日益明显。与吴晓刚等(Wu and Treiman,2004)利用“当代中国生活史与社会变迁调查”(LHSCCCH1996)数据⁶得出1996年以前10年户籍非农化的风险水平有所下降的结论不同,本研究汇总的多个数据表明,1996年及以前的10年农民子女户籍非农化水平还有不太明显的提升。CGSS2010数据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11年数据汇总的结果同样表明,尽管中国城市建设如火如荼,但户籍非农化水平在最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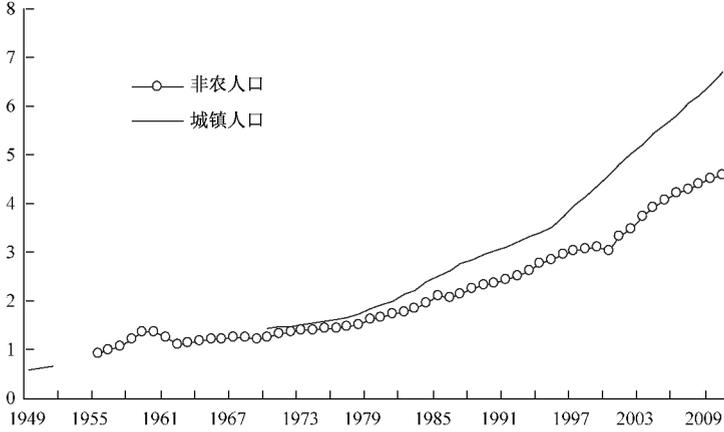
2. 这仅仅是一个操作定义,其他研究者可以选择不同的年龄点。笔者根据以往社会流动研究选择了14岁作为参照点,是因为这一年龄通常处于初中阶段,在成为劳动力之前,户籍变化较少。对18岁这一年龄点的选择,则是因为数据仅仅询问了受访者这一年龄时父母的信息。其他来源的数据缺乏这一信息,因此,本文将14岁时以前未获得非农户口的人都定义为农民子女。此外,1936年前出生的人不在研究范围,认为自己1958年以前即获得非农户口的人被认为生来就是非农人口。

3. 此处不考虑多次进出非农职业以及最终回到农业生产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非农化比例。

4. 关于CGSS2006数据的背景信息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2008)。后文使用的CGSS2008和CGSS2010均来自于同一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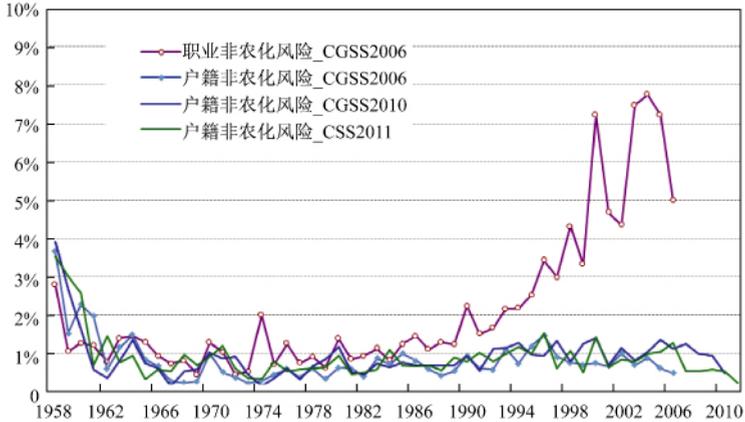
5. 图2中各年的风险水平是通过将截面调查数据转变为入年数据计算得到的。数据中年龄较大案例经历的风险期较长,而年龄较小者经历的风险期较短。越远离调查年份,人口年龄结构越偏离正常结构,不控制各个风险年份的人口年龄结构,可能影响非农化水平的估计。因此,图中两个比率用总体的年龄结构作为标准年龄结构进行了标准化。

6. 参见网址:<http://www.sscnet.ucla.edu/issr/da/lhscs/chinaweb.html>。



资料来源：城镇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2》(1981 年及以前数据为户籍统计数；1982、1990、2000、2010 年数据为当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数；其余年份数据为年度人口抽样调查推算数据)；1998 年及以前非农户籍人口数据来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1999》(公安年报户籍人口统计数)；1999 年及以后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公安部《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数》；2000 年数据来自 200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

图 1：1949—2010 年中国非农户籍人口与城镇人口规模对比(单位：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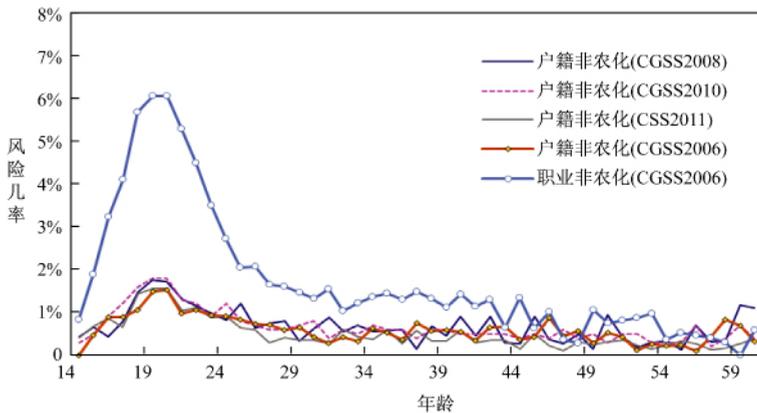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CGSS2006、CGSS2010、CSS2011。

图 2：1958—2006 年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与户籍非农化的几率

几年仍没有实质性提高。⁷

依据上述风险集数据,我们还可计算出 CGSS 调查样本在各个年龄上的平均非农化风险,得到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的年龄模式(图 3),可以看到,农民子女在 20 岁左右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的几率都相对较高,但职业非农化的水平相对于户籍非农化的差距也最大。此后,两种非农化的机会都快速下降,到 45 岁以后,职业非农化与户籍非农化的水平共同趋近于 0,且职业非农化的水平几乎都始终高于户籍非农化的水平。如果农民子女都以这种模式度过一生,最终将有大量农民子女从事非农职业但终其一生都无法获得城市市民身份,从而出现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身份及认同的断裂。

农民子女非农化的年龄模式与水平在不同队列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图 4 为采用事件史方法得到的不同就业队列职业非农化与户籍非农化的 Kaplan-Meier 生存函数图,⁸我们可以看到,各条曲线不仅存在水平差异,还不完全平行。年轻一代的农民子女非农化的速度相对越快(曲线的斜率越大),但是职业非农化(包括相对稳定的职业非农化)和户籍非农化之间的相对差距也更大,两种非农化之间的断裂更为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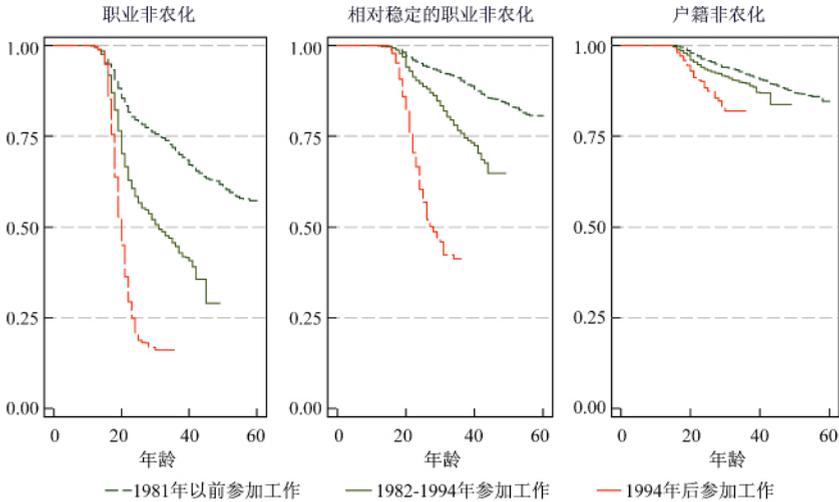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CGSS2006、CGSS2008、CGSS2010、CSS2011。

图 3: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与户籍非农化的年龄几率

7. 由于 CGSS2010 和 CSS2011 未询问非农职业获得时间,无法做出职业非农化风险曲线,下图同此。

8. 不同出生队列的模式差异略小,但结论类似。



资料来源:CGSS2006。

图 4:不同队列的农民子女非农化的 Kaplan-Meier 生存估计

表 1 依据年龄和参加工作年份将农民子女分成几组,描述他们截至调查时获得非农户籍和曾经从事过非农工作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年龄较大的农民子女获得非农户籍的比例更高,而年轻人实现职业非农化的比例更高。⁹为了将职业非农化的质量考虑进来,我们认为,受访者从事的非农职业如果至少具有如下特征之一,其职业非农化就会相对较为稳定:与雇主签订了劳动合同、雇主提供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自己从事经营活动且有工商营业执照或至少有一位雇员。同样,越年轻、参加工作越晚的农民子女实现相对稳定的职业非农化的比例越高。身份市民化与职业非农化之间的差距在年轻人中最大,户籍非农化的比例远远落后于职业非农化。这从户籍非农化比例与职业非农化比例的相对比值也可以看出。

概括而言,在农民子女市民化的过程中,职业非农化长期快于身份的市民化,两者之间的断裂日益明显。一方面,中国确实有大规模的劳动力城市化和职业非农化,因此,从职业流动的视角看,社会流动和开放

9. CGSS2010 数据中各出生队列户籍非农化比例更高,分别为 27.2、21.4、19.6、23.0 和 19.6。年轻队列与年老队列非农化比例差异更小。

表 1:不同队列的农民子女的非农化情况(%)

属性	户籍非农化比例	职业非农化比例	稳定的职业非农化比例	户籍非农化比职业非农化	样本基数
出生队列(年)					
1946 前	18.5	31.1	12.6	0.595	119
1946—1956	14.8	40.0	16.5	0.370	1333
1956—1966	12.8	45.2	20.0	0.284	1316
1966—1976	11.7	57.3	26.4	0.204	1439
1976 后	8.5	75.6	36.1	0.112	1167
参加工作时间(年)					
1981 前	12.8	39.5	16.7	0.325	2514
1982—1994	11.3	56.2	23.9	0.200	1661
1994 后	12.1	78.9	40.4	0.153	1200

资料来源:CGSS2006 的加权数据。除户籍非农化比例在各工作队列中的比例差异不显著外,其他各指标都在 0.001 水平上显著。

度不错。但是,农民子女身份市民化却相对较为迟缓,作为城市化核心的人的城市化相对落后,仅仅看到大规模的职业流动并不足以概括中国社会流动的全貌。另一方面,庞大的中国有尚未享受到市民待遇的流动人口和产业工人队伍,他们有部分获得了较为稳定的非农就业机会,尽管不多,但至少还是有一部分获得了身份市民化的机会。两个方面综合在一起,才是更完整的社会面貌。

至于这种断裂何以在中国出现,上述市民化机会,特别是有限的户籍非农化机会在农民子女之间是依照何种方式分配,分配机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是否发生了变化,都还需要通过具体和深入的研究进行进一步探究。具体就本研究而言,可以追问这样的问题:在上述断裂背景下,不同特征(如不同地区、不同年代、不同文化水平、父母能力不同)的农民子女在非农化上是否存在差异?上述断裂对不同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三、市民化机会的分配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限的市民化机会被政府用来奖赏那些可能或已经给国家和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人及其家属,并且职业的非农化与户籍身份的变更常相伴发生。被选中的农民子女以升学、招工、参军和家属随迁等名义获得非农就业机会及相应的城市居民待遇。当然,奖赏分配的过程也是个体能动争取的过程,但机会始终控制在政府手中。在改革开放后,体制外非农就业机会的出现使职业非农化不再完全受国有、集体单位或政府控制。人们利用各种非官方的资源和渠道

离开农业,实现了不同层次的职业非农化。政治忠诚和官员家庭背景对于非农就业机会的获得及收入水平高低的影响有变弱的趋势(边燕杰、李路路,2003)。同时,户籍非农化机会尽管仍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但由于阶段性任务的不同,政府分配非农户籍时奖赏和补偿的方向也在不断调整,从最初优先国防和工业建设,到优先各种社会主义优秀人才培养,再转为推动和支持城市化发展。直接可以观察到的变迁便是人们获得非农户籍的渠道构成的快速变化。

从表2可以看到,参军、招工和转干三种途径¹⁰在获得非农户籍中的影响不断下降,而征地、购房、户口改革和直接购买户口¹¹在1994年之后对获得非农户籍的影响日益增大。升学和家属随迁转在改革初期(1982—1994)有较大的影响,此后作用相对有所下降。各非农化渠道相对作用的变化虽不是必然意味着资源分配原则的变化,但对处于不同社会位置和资源禀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影响。在总的非农化机会没有显著增长的背景下,渠道变化导致不同特征的家庭和个人的相对位置的变化也就更加明显。

非农化渠道变化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对农民子女中女性的不同影响上。从表2可见,参军、转干原本就很少是女性获得非农户籍的主要途径,但对于男性却有较大作用。因此,这两个渠道的弱化对男性的影响更大,对女性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影响。家属随转(婚嫁)一直是女性获得非农户籍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男性很少能够通过家属随转获得非农户籍。因此,家属随转渠道一旦弱化,对于女性的影响可能更大。升学对非农化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有所提升,但对男性的重要性明显高于对女性的。不过教育对于女性户籍非农化的相对重要性是持续提高的,但对于男性户籍非农化的相对作用在改革后期似乎有下降的趋势。此外,征地、购房、户口改革和购买户口对于男性非农化重要性的变化比在女性中大。

10. CGSS2008、CGSS2010、CGSS2011 都询问了有非农业户口的农民子女获得非农户口的原因。由于 CGSS2011 年的样本量较小,且没有提供权重系数,我们暂且使用 2010 年的调查结果。另外 CGSS2011 也询问了类似的问题,但没有询问那些目前是居民户口以前是农业户口的人户籍变换的时间与原因,因此具体的百分比有所差异,但整体结论与 CGSS2010 一致,且样本量较小,此处从略。

11. CGSS2011 调查中增加了这一条原因,结果显示,获得户籍的人中购买户籍的比例涨到 5% 左右,近年有增长趋势,并且 1967—1976 年出生的队列购买户口的比例最高。

表 2: 获得非农户籍的原因随获得年份变化的情况(%)

	户籍获得年份														
	1970 前			1970 - 1981			1982 - 1994			1994 后			合计		
	全体	男	女	全体	男	女	全体	男	女	全体	男	女	全体	男	女
升学	21.4	22.7	17.2	13.0	14.4	10.4	22.3	29.7	14.9	21.5	27.3	16.8	20.5	25.2	15.5
参军	11.0	14.4	0.0	8.4	12.8	0.3	3.3	6.4	0.3	1.7	3.7	0.0	3.9	7.4	0.1
招工	53.7	56.9	43.4	50.2	60.7	30.4	29.3	34.3	24.3	13.0	16.4	10.2	26.8	34.6	18.4
转干	2.6	3.4	0.0	2.9	4.4	0.0	1.0	1.5	0.5	0.9	0.8	0.9	1.3	2.0	0.6
征地	1.2	0.0	4.9	3.7	1.4	7.8	11.1	6.9	15.3	20.9	22.0	20.0	13.7	11.1	16.6
家属随转	9.2	1.4	34.4	16.9	4.8	39.4	21.9	10.7	33.0	15.0	5.6	22.8	17.1	6.6	28.4
购房	0.0	0.0	0.0	0.3	0.0	0.9	1.7	1.9	1.5	10.8	8.4	12.7	5.5	3.9	7.2
户口改革	0.0	0.0	0.0	2.7	1.4	5.2	4.5	4.2	4.8	10.6	10.0	11.1	6.7	5.5	7.9
其他	0.9	1.1	0.0	1.9	0.0	5.5	4.9	4.4	5.4	5.6	5.8	5.5	4.5	3.8	5.3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样本数	159	116	43	274	164	110	607	280	327	812	340	472	1 851	899	952

资料来源:CGSS2010 的加权数据中 14 岁后获得非农户籍农民子女案例;各队列差异的统计检验都在 0.001 水平上显著。

社会变迁发生时,因为年龄不同,人生历程不同,受到的影响也可能存在差异。如果还经常采用“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原则,这种差异就会更清楚。非农化渠道的变化对不同队列的农民子女的影响也不同。从出生队列的比较看(见表3),参军、招工和转干对于年轻人的影响要小很多。升学(主要是读大学)成为70后和80后获得非农户籍最重要的途径。其他途径,如家属随迁、征地、户口改革、购买户口等在不同队列中的相对作用差异不大。¹²

表3:获得非农户籍的途径随出生年份变化的情况(%)

	出生队列					合计
	1946前	1947—1956	1957—1966	1967—1976	1976后	
升学	11.5	6.5	12.6	21.6	48.8	20.5
参军	6.0	4.3	4.8	2.8	2.6	3.9
招工	44.8	37.4	27.6	19.3	13.1	26.8
转干	4.4	1.8	0.8	0.6	0.3	1.3
征地	10.9	17.4	18.7	13.6	6.7	13.7
家属随迁	14.7	19.6	17.3	18.9	13.1	17.1
购房	1.0	2.4	5.1	8.7	7.5	5.5
户口改革	4.3	7.3	7.8	7.1	5.8	6.7
其他	2.4	3.2	5.3	7.4	2.2	4.5
合计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样本数	275	357	373	516	330	1 851

资料来源:CGSS2010的加权数据中14岁后获得非农户籍农民子女案例;
统计检验在0.001水平上显著。

我们还可以如上逐一探索其他不同类别的农民子女在非农化方面的差异,表4给出了不同特征的农民子女实现户籍非农化和职业非农化的比例。从表面上看,男女户籍非农化比例差异很小,但男性职业非农化的比例高于女性。教育水平越高,获得非农户籍和非农职业的农民子女比例越大;党员身份、从军经历、地区发展程度与非农化之间都存在正向的关联。如果以户籍非农化与职业非农化比例的比值来衡量市民化两个方面的差距(比值越小差距越大),可以看到两种非农化在男性、少数民族、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人和非党员农民子女内部断裂更为严重。

上面的分析并未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分析效率也比较低。为此,下面将通过多元分析的办法来探索控制其他变量及随

12. 在CGSS2010和CSS2011年的数据中,1976年出生队列中因征地而获得非农户籍的比例相对较小,但在CGSS2008数据中,各队列相差不明显。

表 4:不同特征的农民子女中实现非农化的比例(%)

属性	户籍非农化比例	职业非农化比例	稳定的职业非农化比例	户籍非农化/职业非农化	样本基数
性别					
女性	11.7	45.8	19.2	0.256	2 698
男性	12.6	61.1	29.2	0.207	2 677
民族					
少数民族	3.1	51.6	18.2	0.060	577
汉族	13.3	53.6	24.9	0.247	4 798
教育水平					
文盲半文盲	3.6	20.5	4.6	0.175	668
小学	6.6	39.3	12.7	0.168	1 679
初中	9.6	63.8	27.2	0.151	2 131
高中	21.7	69.0	39.9	0.314	461
职校	41.3	87.7	60.6	0.471	317
大专及以上	68.9	99.2	85.7	0.695	119
政治面貌					
非党员	11.9	53.0	23.7	0.225	5 307
党员	33.8	85.3	58.8	0.397	68
参军经历					
未参加过军	11.6	52.6	23.3	0.220	5 162
参加过军	26.8	72.8	45.1	0.368	213
调查地区					
东部	16.7	68.3	32.6	0.245	1 449
中部	10.7	49.2	22.3	0.218	2 431
西部	10.2	46.0	19.1	0.221	1 495
合计	12.2	53.4	24.2	0.228	5 374

数据来源:CGSS2006。表中样本基数为加权后的结果,未加权样本总数为 4 347 个。

机误差之后,群体之间的差异是否仍然存在。如表 5 所示,本文利用 CGSS2006 调查中的农民子女数据,估计了三个非农化的事件史 COX 模型(Grambsch,2000;Guo,2010),从结果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性职业非农化的发生比比女性高出 30%左右;但男性户籍非农化的可能性只有女性的 62%左右。统计检验结果表明,上述差异来自随机误差的可能性非常小。农民子女在非农化上的这种差异可能与男女性别分工以及男女非农化渠道不同相关。由于男性更多承担家庭经济责任,收入更高的非农职业首先成为男性争取的对象。近年来,不少地方留守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正是男性劳动力优先外出和非农化的结果(韩国明、张佩,2012;吴惠芳、

表 5: 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与户籍非农化 COX 模型对比(N=4 314)

	职业非农化	相对稳定的职业非农化	户籍非农化
男性	1.280*** (0.064)	1.305*** (0.098)	0.620*** (0.063)
年龄	0.946*** (0.003)	0.935*** (0.005)	1.019** (0.006)
汉族	0.902 (0.092)	1.066 (0.168)	2.807*** (0.815)
教育水平	1.102*** (0.010)	1.159*** (0.016)	1.216*** (0.022)
高等教育	0.757*** (0.058)	1.549*** (0.178)	4.938*** (0.799)
参军经历	1.505*** (0.160)	1.750*** (0.273)	1.703* (0.384)
党员	0.882 (0.080)	0.894 (0.119)	0.936 (0.159)
父亲教育	1.020** (0.007)	1.032** (0.010)	1.014 (0.015)
父亲职业	1.390*** (0.076)	1.420*** (0.113)	1.411** (0.167)
文化资本	1.072** (0.023)	1.093** (0.034)	1.013 (0.043)
中部地区	0.710*** (0.039)	0.837* (0.068)	0.851 (0.098)
西部地区	0.652*** (0.042)	0.714*** (0.069)	0.845 (0.108)
伪确定系数	0.0421258	0.0757638	0.090592
对数似然比	-17600.42	-7721.957	-3797.787

数据来源:CGSS2006。

注:1. 表中系数为指数化风险比率,括号中为标准误。父亲教育为受教育水平。父亲职业为二分类变量,如果主要从事非农职业或者有技术职称、管理职位赋值为1,否则为0。文化资本操作化为18岁时家庭藏书量。

2. 显著性水平:*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饶静,2009)。而在户籍非农化方面,婚姻是女性实现上向流动的重要渠道,她们可以通过嫁给非农户籍男性获得城市户籍。但在“女不下嫁”的观念下,男性娶城市媳妇获非农户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因此,在其他各方面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女性仍有一条特有的城市化渠道,其户籍非农化的机会更高。不过,农民的儿子在教育、政治面貌、参军等方面比女儿具有优势。因此,在前面的简单描述中,男女户籍非农化比例差

异不大。基于上述分析提出：

假设 1.1：随着职业非农化机会，尤其是一些偏好女性的制造业、服务业就业机会的增加、女性非农职业回报率的提高、男女教育水平差距的缩小，以及年轻一代农民子女从事农业生产兴趣的普遍下降，女性在职业非农化方面与男性的差异可能会越来越小。

而在户籍非农化方面，随着家属随转渠道在户籍非农化方面的作用减弱，男女平等观念普及、婚嫁观念的改变、人口结构的变迁和城乡男女互动机会的增加使城市女性嫁给农民子女的情况增加（郭志刚、李丁，2010）。因此提出：

假设 1.2：在控制其他变量后，男女在户籍非农化机会方面的差异会逐渐下降。

第二，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获得高等教育的农民子女户籍非农化的发生比是无高等教育经历者的 4.9 倍，获得高等教育的农民子女的稳定的职业非农化是无高等教育经历者的 1.5 倍。教育是促进非农化的重要因素，这在以往的研究中也被多次发现（边燕杰等，2002，2008；吴晓刚，2006；2007）。

但教育对非农化的影响可能在不同阶段因政策环境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社会革命及计划经济时代，虽然人力资本是国家选择工人和干部的标准之一，但政治标准更重要，教育水平高的人社会流动的机会甚至更少（边燕杰等，2002，2008）。因此，在改革前，教育对非农化有影响，但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的差异相对较小；在改革后，教育及其代表的人力资本得到更多重视，读书上学在农民子女跳出农门方面的作用得到强化，不同教育水平的人职业非农化及户籍非农化机会的差异应该有所扩大。但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职业非农化门槛的下降，教育水平对职业非农化的影响应该会有所下降。

近年来，城市扩张和行政区划变革加快，但由此带动的户籍非农化与个体的教育水平等特征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只要个体为相应辖区内的成员，即可转为非农户籍或居民户籍，因此，这种非农化机会的增加会扩大不同地区农民子女之间的不平等。但绝大多数地区仍奉行选择性落户政策，偏好教育水平高的高素质劳动力。因此，教育水平，特别是大专以上学历对获得非农户籍的影响即使到了最近仍然可能较大，甚至有所强化。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1:控制其他变量后,教育水平对职业非农化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弱—强—弱”的变化。

假设 2.2:教育水平对于户籍非农化的影响呈现出“弱—强—强”的态势。

第三,家庭背景对非农化有一定影响。家庭背景在社会流动与地位获得中的作用通常被用来评估社会的开放程度,作用越大,社会的开放度越低(Blau and Duncan,1967)。家庭背景可以用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等进行衡量(格伦斯基,2005),它们代表着家庭可用于子女成长和发展的资源的丰富程度。资源越丰富,子女获得较好发展机会的可能越大。从上述模型结果可以看到,家庭背景带来的职业非农化差异更为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对非农户籍的控制远严格于非农工作。

家庭背景作用于子女非农化的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种是直接干预非农化过程,通过权力优势、经济优势和信息优势为子女争取非农化机会;另一种是增进子女的能力和素质(如支持子女接受教育),间接地提高子女非农化机会。改革前,有一段时期,中国的正式教育系统并不完善,农村家庭即使想投资子女的正式教育也很难,农民子女的正式教育水平差异不大,家庭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将家庭资本等转变为子女的素质和能力。因此,在改革前,控制个体教育水平后家庭背景应该还有一定的影响,但随着教育制度(包括市场上的教育培训组织)的发展和受教育机会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家庭可以通过投资子女正式教育帮助子女实现非农化。即便是那些最有权势的家庭也不会放弃这一渠道,甚至更为充分地利用这一渠道(吴晓刚,2009)。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1:在控制个体教育水平等相关因素后,家庭背景对职业非农化的影响减弱。

假设 3.2:到晚近阶段,控制教育水平后,家庭背景变量,如父亲的教育水平、父亲的职业和家庭的文化资本等对户籍非农化的影响应该会变小,甚至消失。

四、分配机制在变化吗

为了验证上述因素对于非农化的影响是否朝着估计的方向变化,

本文分别估计了不同就业队列¹³的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与户籍非农化的 COX 模型(见表 6)。由于截面数据中的队列差异与年龄及时期效应混合在一块,不同队列之间的差异因此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时期间的差异。之所以如此简化,是缺少改革不同阶段的重复性调查数据的结果。当然,也有不少努力尝试分离年龄—时期—队列的交互效应,但无一不存在较为强烈的假定(梁玉成,2007),本文暂不做这样的努力。利用队列的差异来近似地探究变化趋势的做法在以往研究中经常使用,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Zhou, *et al.*, 1997; 郝大海、王卫东, 2009)。

通过比较表 6 中各个队列对应因素的作用系数可以探索相关变量的作用是否发生变化,而队列虚拟变量与其他自变量全交互的模型中相应交互项的统计检验可以对相关变量在不同队列中的系数差异是否显著进行检验(Clogg, 1995; Aiken, 1991)。如果同一变量在不同队列中的作用系数存在显著差异,即相关变量与队列之间的交互作用很可能并不来自随机误差,则非农化的机制确实可能发生了相应变化。

从各队列中相应系数的大小及统计检验可以得到前文有关假设的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不同性别的农民子女在非农化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尤其是职业非农化方面的差异明显缩小,不同队列中相应系数的差异在统计上显著。个人教育对于职业非农化的影响确实经历了“弱—强—弱”的变化。对于 1994 年后参加工作的队列来说,在控制其他条件的情况下,拥有高等教育水平的人会明显推迟职业非农化。个人教育对户籍非农化的影响在不同队列中始终保持着显著的强烈影响,并且高等教育水平的影响在改革后有所增强,但这一增长不排除是随机误差造成的,因为统计检验表明上述差异并不显著。家庭背景对不同队列的非农化的影响相对稳定,父亲是否以非农职业为主业、有专业技术职称或行政岗位对其子女获得非农工作和非农户籍都有相对稳定的正向作用,对于户籍非农化的影响有所增强,但变化不显著。地区变量对应的系数在不同队列中虽有波动,但统计检验表明这些差异并不显著。

整体而言,在新近参加工作的队列中,职业非农化机会的分配更少受性别与教育水平的影响,家庭背景的影响仍持续存在。关于职业非

13. 队列划分的时点参考了梁玉成(2007)关于中国市场化与现代化进程的相关研究。社会变迁是一个连续过程,选择这些时间点周围的其他年份并不会对主要结论构成威胁。

表 6:不同就业队列职业非农化与户籍非农化 COX 模型结果

	职业非农化				户籍非农化			
	1981 年前	1982 - 1994 年	1994 年后	1981 年前	1982 - 1994 年	1994 年后	1981 年前	1994 年后
男性	1.485*** (0.139)	1.224* ^a (0.108)	1.132 ^a (0.096)	0.655** (0.098)	0.586** (0.101)	0.831 (0.175)	0.655** (0.098)	0.831 (0.175)
年龄	0.979** (0.007)	0.947*** (0.009)	0.872*** (0.009)	1.049*** (0.014)	1.045* (0.019)	1.054* (0.027)	1.049*** (0.014)	1.054* (0.027)
汉族	0.852 (0.137)	0.727* (0.110)	1.293 ^a (0.275)	2.424* (0.919)	2.896* (1.478)	5.618 ^a (4.975)	2.424* (0.919)	5.618 ^a (4.975)
教育水平	1.093*** (0.016)	1.131*** ^a (0.017)	1.064** (0.020)	1.192*** (0.028)	1.264*** (0.046)	1.186*** (0.059)	1.192*** (0.028)	1.186*** (0.059)
高等教育	1.516 (0.345)	1.051 ^a (0.129)	0.684*** ^a (0.086)	3.610*** (1.003)	6.137*** (1.747)	4.674*** (1.561)	3.610*** (1.003)	4.674*** (1.561)
父亲教育	1.012 (0.013)	1.014 (0.011)	1.025 (0.014)	1.026 (0.020)	1.038 (0.023)	0.950 ^a (0.030)	1.026 (0.020)	0.950 ^a (0.030)
父亲职业	1.424*** (0.148)	1.534*** (0.137)	1.224* (0.115)	1.397* (0.233)	1.463* (0.283)	1.652* (0.384)	1.397* (0.233)	1.652* (0.384)
文化资本	1.088* (0.047)	1.056 (0.040)	1.086* (0.037)	1.107 (0.074)	1.016 (0.071)	0.981 (0.080)	1.107 (0.074)	0.981 (0.080)
中部地区	0.738** (0.074)	0.603*** (0.058)	0.799* (0.075)	0.938 (0.158)	0.917 (0.174)	0.661 (0.182)	0.938 (0.158)	0.661 (0.182)
西部地区	0.668*** (0.079)	0.618*** (0.064)	0.630*** (0.078)	0.795 (0.152)	0.639 (0.153)	0.179 (0.298)	0.795 (0.152)	0.179 (0.298)
伪确定系数	0.022	0.026	0.029	0.062	0.133	0.139	0.062	0.139
对数似然比	-5612.797	-5308.564	-4275.939	-1742.006	-965.7485	-604.6715	-1742.006	-604.6715
样本数	1 993	1 418	903	1 993	1 418	903	1 993	903

注:1.表中系数为指数化风险比,括号中为标准误;显著性水平:*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2.上标 a 表示相关自变量与队列变量虚拟变量(1981 年以前参加工作的队列为参照组)的交互项对应系数在 0.05 水平以上显著,未标明则统计检验不显著。

表 7:各假设的检验结果

假设	假设内容	检验结果
1.1	男女在职业非农化上的差异变小	得到验证
1.2	男女在户籍非农化上的差异变小	变小,但差异不显著
2.1	教育水平对职业非农化的影响呈“弱—强—弱”的变化	得到验证
2.2	教育水平对户籍非农化的影响呈“弱—强—强”的态势	变强,但增长不显著
3.1	在控制个体教育水平等相关因素后,家庭背景对职业非农化的影响减弱。	稳定未变,差异不显著
3.2	在控制个体教育水平等相关因素后,家庭背景对户籍非农化的影响减弱。	未得到验证,有所增强,但不显著

农化的假设 1.1、假设 2.1 得到验证,假设 3.1 未得到验证。也就是说,在年轻人队列中,虽然非农就业机会和正式教育机会已经大大增加,但家庭因素似乎对职业非农化过程的介入并无明显消退。相反,关于户籍非农化的三个假设都未能得到明确的验证,户籍非农化机会在各群体之间的分配格局似乎更为稳定。不过,模型结果表明,教育是影响晚近队列户籍非农化的重要因素,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后两个队列的户籍非农化模型的伪确定系数远远大于职业非农化模型,且仅仅纳入教育水平和是否接受高等教育这两个变量,伪确定系数也达到 0.11 以上)。如果资源分配更多地依赖个体的能力而非家庭的背景说明这种分配相对较为公平,那么,相对于职业非农化,户籍非农化机会在农民子女之间的分配保持着相对的公平性。

教育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增强使得对教育资源和教育获得的研究变得更为重要。有关教育获得的研究表明,家庭背景对教育获得有明显影响,教育机会在不同家庭之间的分配并不平均,优势家庭试图通过教育努力维持阶层之间的差异(吴晓刚,2009),这也是社会公众日益关注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重要原因。不过,上述分配机制至少在表面上比较公平和相对得民心。长久以来,学界和公众对户籍制度及户籍非农化机会太少确实有很多批评,但对户籍非农化机会在农民子女之间分配的公平性并没有明显的质疑。这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首先,相当部分户籍非农化机会是通过升学这一相对公开的渠道分配出去的,招工、转干、家属随转等更可能藏有“猫腻”的途径在弱化;其次,户籍制度改革直到最近才刚刚开始,一些地区开始试验积分入户等户籍政策,但

真正因此而获得城市户籍的人仍然少得可怜；¹⁴第三，对户籍非农化影响越来越大的征地拆迁和行政区划变更，在进行利益补偿过程中也保持了相对的内部公平性。关于集体经济和征地问题的研究表明，征地补偿和安置(包括户籍非农化机会)在集体内的分配奉行着平均主义原则。

五、结论

本文认为，对农民子女市民化进程的研究不仅可以化解以往社会分层研究和劳工研究因样本选择性而带来的结论偏差问题，还能抓住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从新的角度对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与社会流动提供见解。通过将 14 岁以前未获得非农户籍的人定义为“农民子女”，本文利用 CGSS 等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对农民子女市民化的两个方面——职业非农化和身份市民化(或户籍非农化)——的水平和分配方式进行的探索。结果表明，户籍非农化及其所代表的身份市民化机会长期供给不足造成了农民子女职业非农化与身份市民化的巨大断裂。虽然户籍非农化渠道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综合分析表明，户籍非农化机会的分配仍算相对公平，控制相关条件后，个体受教育水平有着很强的解释能力。

户籍非农化机会的供给不足与国家和资本过于功利地利用农村劳动力有关。除完善的制度、先进的技术、广阔而统一的市场和廉价的资源与土地外，中国的现代化与经济发展同样离不开大量廉价而规训有素的劳动力。通过制造、维持并利用巨大的城乡差异以及农民对于现代生活的向往，国家不仅保证了劳动力的廉价性，还激发出他们对于金钱的强烈愿望与高度禁欲主义精神。尽管政府吝啬于农业投资、农村开发、劳工保护和城市外来人口公共福利供给有千万种理由，但归根结底是想降低发展的直接成本，提高发展的速度(黄宗智，2009，2010；潘毅等，2009)。尽管有所反抗并越来越频繁，但整体而言，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农民子女是温和的，或者说是“失语”而“不行动”的(陈映芳，2005a；潘毅，2008；潘毅、陈敬慈，2008；余晓敏、潘毅，2008)。将自己定位为城市的“局外人”，容易满足于生活的相对改善，或已经异化于消费

14. 广州市 2010 年通过积分入户的人数 3 227 人(参见：<http://news.xinmin.cn/rollnews/2011/07/22/11484919.html>)；2012 年首批通过积分取得深圳户籍的有 9 882 人(参见：http://www.szhkrs.com/News_view-314.html)。

主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种温和与不行动(陈映芳,2005a)。但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意分化农民子女群体,并努力维持一定限度的公平性,为这种温和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户籍制度将中国人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而等级化的职业非农化机会和有限的户籍非农化机会又将农民子女分割为不同的群体,防止了规模庞大的农民子女直接以新市民或公民的身份要求与老市民同等的公民权利。非农化机会在农民子女内部相对公平分配和充足的非农化就业机会进一步平息了农民对国家政策的不满。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市民化必将提速。政策的剧变也许会在一夜之间将大量农民子女的农业户籍转变为城市户籍,但若不能保证这种机会的分配公平有效,剧变很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公平。同样,剧变如果不能带来实质性的权利平等,新老市民之间的不均等将更容易成为公共议题。考虑到市民权利普及所带来的巨大公共资源负担、新老市民融合的长期性,以及广泛存在的发展不均,市民化绝对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如何实现农民子女非农化适度而公平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边燕杰、卢汉龙、孙立平,编.2002.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编.2008.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着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蔡昉.2010a.被世界关注的中国农民工——论中国特色的深度城市化[J].国际经济评论(2):40—53.
- 蔡昉.2010b.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1):2—10.
- 陈柏峰.2012.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及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J].开放时代(3):31—46.
- 陈丰.2007.从“虚城市化”到市民化:农民工城市化的现实路径[J].社会科学(2):110—120.
- 陈映芳.2003.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88—95.
- 陈映芳.2005a.“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J].社会学研究(3):119—132.
- 陈映芳.2005b.中国人的城市化[J].博览群书(3):15—19.
- 陈映芳.2012.城市中国的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邓玮.2004.日本中间阶层发展的可鉴之处[J].社会24(5):46—48.
- 段成荣、马学阳.2011.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状况[J].人口与经济(4):16—22.
- 段成荣、杨舸、张斐、卢雪和.200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变动的九大趋势[J].人口研究(6):30—43.

- 方金友. 2007. 中产阶级的演变及社会功能[J]. 国外社会科学(3):54-57.
- 方长春. 2009. 趋于隐蔽的再生产——从职业地位获得看阶层结构的生成机制[J]. 开放时代(7):116-127.
- 冯仕政. 2008. 重返阶级分析? 论中国社会不平等研究的范式转换[J]. 社会学研究(5):203-228.
- 格伦斯基,戴维,编. 2005. 社会分层[M]. 北京:华夏出版社.
- 管明. 2010. 乡城迁移式农民市民化界定与实现路径探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21-27.
- 郭志刚、李丁. 2010. 上海市近年人口发展状况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6):13-22.
- 韩国明、张佩. 2012. 村庄空心化背景下以留守妇女为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研究[J]. 理论月刊(11):167-172.
- 郝大海. 2010. 流动的不平等:中国城市居民地位获得研究(1949-2003)[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郝大海、王卫东. 2009. 理性化、市场转型与就业机会差异——中国城镇居民工作获得的历时性分析(1949-2003)[J]. 中国社会科学(3):140-151.
- 黄宗智. 2009. 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J]. 开放时代(2):51-73.
- 黄宗智. 2010. 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与实用含义——非正规经济实践[J]. 开放时代(10):134-154.
- 李春玲. 2005. 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春玲. 2006. 流动人口地位获得的非制度途径——流动劳动力与非流动劳动力之比较[J]. 社会学研究(5):85-106.
- 李春玲. 2007. 城乡移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5-11.
- 李春玲. 2008. 中国中产阶级的增长及其现状[J]. 江苏社会科学(5):68-77.
- 李春玲. 2011. 寻求变革还是安于现状:中产阶级社会政治态度测量[J]. 社会 31(2):125-152.
- 李骏、顾燕峰. 2011. 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J]. 社会学研究(2):48-77.
- 李路路. 2003a. 再生产的延续:制度转型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李路路. 2003b. 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英文)[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4):3-9.
- 李路路. 2003c. 制度转型与阶层化机制的变迁——从“间接再生产”到“间接与直接再生产”并存[J]. 社会学研究(5):42-51.
- 李路路. 2006. 再生产与统治——社会流动机制的再思考[J]. 社会学研究(2):37-60.
- 李路路. 2008. 中间阶层的社会—政治功能:新的问题和视角[J]. 探索与争鸣(7):11-13.
- 李路路、秦广强、陈建伟. 2012. 权威阶层体系的构建——基于工作状况和组织权威的分析[J]. 社会学研究(6):46-76.
- 李路路、王宇. 2008. 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社会存在:阶层认知与政治意识[J]. 社会科学战线(10):202-215.
- 李强. 1999. 市场转型与中国中间阶层的代际更替[J]. 战略与管理(3):35-44.
- 李强. 2004.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李强. 2005. 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J]. 社会 25(1):28-42.
- 李强. 2010.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测量与分析[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梁玉成. 2006. 渐进转型与激进转型在初职进入和代内流动上的不同模式——市场转型分析模型应用于中国转型研究的修订[J]. 社会学研究(4):34-58.
- 梁玉成. 2007. 现代化转型与市场转型混合效应的分解——市场转型研究的年龄、时期和世代效应模型[J]. 社会学研究(4):93-117.
- 林宗弘、吴晓刚. 2010. 中国的制度变迁、阶级结构转型和收入不平等:1978-2005[J]. 社

- 会 30(6):1-40.
- 刘传江、程建林. 2008. 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 人口研究(5):48-57.
- 刘精明. 2001. 向非农职业流动:农民生活史的一项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6):1-18.
- 刘精明、李路路. 2005. 阶层化:居住空间、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与阶层认同——我国城镇社会阶层化问题的实证研究[J]. 社会学研究(3):52-81.
- 吕大乐、刘硕. 2010. 中产小区:阶级构成与道德秩序的建立[J]. 社会学研究(6):25-40.
- 米尔斯,赖特. 1987.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莫艳清. 2009.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综述[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3):31-34.
- 莫艳清. 2012.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倾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市 X 区为例[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40-44.
- 潘毅. 1999. 开创一种抗争的次文体:工厂里一位女工的尖叫、梦魇和叛离[J]. 社会学研究(5).
- 潘毅. 2005. 阶级的失语与发声——中国打工妹研究的一种理论视角[J]. 开放时代(2):95-107.
- 潘毅. 2007. 打工者:阶级的归来或重生[J]. 南风窗(9):35-37.
- 潘毅. 2008. 失语年代的光与影[J]. 开放时代(2):152-164.
- 潘毅、陈敬慈. 2008. 阶级话语的消逝[J]. 开放时代(5):53-60.
- 潘毅、卢晖临、严海蓉、陈佩华、萧裕均、蔡禾. 2009. 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J]. 开放时代(6):5-35.
- 潘毅、卢晖临、张慧鹏. 2010. 阶级的形成:建筑工地上的劳动控制与建筑工人的集体抗争[J]. 开放时代(5):5-26.
- 潘毅、任焰. 2008. “农民工的隐喻:无法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参见网址: <http://www.wyzxss.com/Article/Class4/200809/50959.html>.
- 潘毅、许怡. 2012. 垄断资本与中国工人——以富士康工厂体制为例[J]. 文化纵横(2):48-54.
- 齐卫平、肖照青. 2003. 理论界关于当代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研究综述[J]. 社会 23(6):41-46.
- 仇立平. 2006. 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J]. 社会 26(4):23-42.
- 任焰、潘毅. 2006a. 工人主体性的实践:重述中国近代工人阶级的形成[J]. 开放时代(3):106-123.
- 任焰、潘毅. 2006b. 跨国劳动过程的空间政治: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J]. 社会学研究(4):21-33.
- 任焰、潘毅. 2006c. 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J]. 开放时代(3):124-134.
- 任焰、潘毅. 2008. 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国家缺位:以宿舍劳动体制为例[G]//和谐社会与社会建设——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2007·长沙). 方向新,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沈晖. 2008. 当代中国中间阶层认同研究[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沈原. 2006. 社会转型与工人阶级的再形成[J]. 社会学研究(2):13-36.
- 孙立平. 2003. 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春光. 2000. 新生代的农村流动人口对基本公民权的渴求[J]. 民主与科学(1):18-20.
- 王春光. 2001.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 社会学研究(3):63-76.
- 王春光. 2002.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外出动因与行为选择[J].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7):30-32.
- 王美艳、蔡昉. 2008. 户籍制度改革的历程与展望[J]. 广东社会科学(6):19-26.
- 温静. 2003. 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和问题[J]. 社会 23(7):17-19.
- 文军. 2004. 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55-61.

- 文军. 2006. 论农民市民化的动因及其支持系统——以上海市郊区为例[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1-27.
- 文军. 2012. “被市民化”及其问题——对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再反思[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7-11.
- 吴惠芳、饶静. 2009. 农业女性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J]. 农业技术经济(2):55-61.
- 吴晓刚. 2006. “下海”: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转型中的自雇活动与社会分层(1978-1996)[J]. 社会学研究(6):120-146.
- 吴晓刚. 2007. 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J]. 社会学研究(6):38-65.
- 吴晓刚. 2009. 1990-2000年中国的经济转型、学校扩招和教育不平等[J]. 社会 29(5):88-113.
- 吴愈晓. 2010. 家庭背景、体制转型与中国农村精英的代际传承(1978-1996)[J]. 社会学研究 02:125-150.
- 吴愈晓. 2011. 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J]. 中国社会科学(1):119-137.
- 徐建玲. 2008.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9):65-70.
- 杨华. 2012. “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中国隐性农业革命”的社会学命题[J]. 开放时代(3):71-87.
- 余京津. 2012.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影响因素研究[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16-17.
- 余晓敏、潘毅. 2008. 消费社会与“新生代打工妹”主体性再造[J]. 社会学研究(3):143-171.
- 张达. 2012. 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分析[J]. 社会工作(9):37-40.
- 张建明、洪大用、郑路、吴善辉. 1998. 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5):65-70.
- 张金荣. 2004. 培育中间阶层建设小康社会[J]. 战略与管理(3):80-83.
- 张裴. 2011.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人口研究(6):100-109.
- 张宛丽. 2002. 对现阶段中国中间阶层的初步研究[J]. 江苏社会科学(4):85-94.
- 张宛丽、李炜、高鸽. 2004. 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构成特征[J]. 江苏社会科学(6):100-107.
- 郑杭生. 2005. 农民市民化:当代中国社会学的重要研究主题[J]. 甘肃社会科学(4):4-8.
- 郑辉、李路路. 2009. 中国城市的精英代际转化与阶层再生产[J]. 社会学研究(6):65-86.
-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 2008.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报告(2003-2008)[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周晓虹. 2002. 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 江苏社会科学(6):37-46.
- 周晓虹, 编. 2005. 全球中产阶级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周晓虹. 2008. 中产阶级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J]. 探索与争鸣(7):8-10.
- 周晓虹. 2011. 中产阶级是怎样诞生的?——欧美及东亚中产阶级的发展历程[J]. 社会观察(2):33.
- 周怡. 2009. 布劳—邓肯模型之后:改造抑或挑战[J]. 社会学研究(6):206-225.
- Aiken, Leona S. and Stephen G. West. 1991. *Multiple Regression: Testing and Interpreting Interactions*. London: Sage.
- Bian, Yanjie and John R. Logan.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Power: The Changing Stratification System in Urban China.”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5):739-758.
- Blau, Peter M. and Danqing Ruan. 1990. “In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Urban China and America.”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9):3-32.
- Blau, Peter M. and Otis Dudley Duncan. 1967.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New York: Wiley.
- Bourdieu, Pierre and Jean-Claude Passeron. 199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 Culture. London: Sage.
- Cao, Yang. 2001. "Careers Inside Organiz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omotion Determination in Reforming China." *Social Forces* 80(2):683-711.
- Clogg, Clifford C., Eva Petkova, and Adamantios Haritou. 1995.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Comparing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Between Model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0(5):32.
- Featherman, David L. and Robert M. Hauser. 1978. *Opportunity and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 Grambsch, Terry M. and Therneau Patricia M. 2000. *Modeling Survival Data: Extending the Cox Model*. New York: Springer.
- Grusky, David B. 1983.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Status Attainment Process; The Thesis of Industrialism Reconsidere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4):494-506.
- Guo, Shenyang. 2010. *Survival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user, Robert M. 1981. "Hope for the Mobility Ratio." *Social Forces* 60(2):572-584.
- Li, Bobai and Andrew G. Walder. 2001. "Career Advancement as Party Patronage: Sponsored Mobility into the Chinese Administrative Elite, 1949-1996."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5):1371-1408.
- Nee, Victor. 1989. "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s in State Soci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5):663-681.
- Nee, Victor and Rebecca Matthews. 1996. "Market Transition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2):401-435.
- Walder, Andrew G. 2002. "Markets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Political Advantage in an Expanding Econom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2):231-253.
- Wu, Xiaogang and Donald J. Treiman. 2004.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55-1996." *Demography* 41(2):363-384.
- Xie, Yu and Alexandra Killewald. 2010. "Historical Trends in Social Mobility: Data, Methods, and Farming." working paper of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of University of Michigan.
- Zhou, Xueguang, Tuma Nancy Brandon, and Phyllis Moen. 1997.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Job-Shift Patterns in Urban China, 1949 to 1994."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3):339-365.

责任编辑:张 军